

#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蒋明敏,孙建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爱国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4-0013-05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创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郭沫若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和阐释历史,继之而起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家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积极与政治领袖互动,联系并团结进步文化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使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勃然而兴。

## 一、毛泽东对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第一,突出史学研究服务社会现实的功用。毛泽东谙熟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道,深知历史经验教训的镜鉴,对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1]</sup>对于共产党员而言,这些经验教训很有教育意义,可以使党员干部少犯错误,提高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把握能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此,他力主将史学与文化的传承、政治的鉴戒、思想的开新以及育人的作用相联系,使传统的史学功能得以放大和现实化<sup>[2]1190</sup>。

第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科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指出,历史具有承继性,今天的中

国正是对历史的中国的继承,“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sup>[3]</sup>。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和革命传统,“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sup>[4]230</sup>。即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

第三,确立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史叙事体例。毛泽东将“对立统一”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指出“阶级的对抗”是矛盾斗争的特殊形式,也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线索。“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sup>[5]</sup>他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阶级的对抗”的表现及其作用,提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战争,进而指出“农民的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以阶级斗争的观点阐释历史嬗变,成为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

第四,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提出用全面的、历史的

收稿日期:2017-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KS009)

作者简介:蒋明敏(1982—),男,江苏溧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法研究历史,要弄清研究对象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厘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过程,关键是“拿中国做中心”“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sup>[6]</sup>,简称“古今中外法”。针对近百年中国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的状况,他提议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分门别类地开展专门史研究,再综合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称之为“四面受敌法”。

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民族的历史、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当他得知何干之有志于民族史的研究,立即致信予以鼓励,肯定了何干之治史的“三个态度”,表示应区分统治者的侵略行径与正义性的反侵略行为;他激励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提议将批判的重点转向近人,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思想斗争”以及教育人民有重要的意义<sup>[4]163</sup>。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下,各类学校增加了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政策的教学内容,增设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和联共党史等课程,形成一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

## 二、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及其活动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蔚为壮观。据统计,包括史学论文作者、史学著作作者和干部学校历史教师在内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多达 100 余人<sup>[7]</sup>,其中历史学家范文澜堪称领军人物。范文澜早年师从刘师培、陈汉章和黄侃治经、修史、学文,精通古文经学、考据学和中国古代文史等,这些学术经历有助于他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声望与学识拿来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服务”<sup>[8]33</sup>。刚到延安,范文澜就被委以重任,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六年间,他实现了从著名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转型。此外,何干之、陈伯达、叶蠖生、尹达、佟冬、金灿然、许立群也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心下,延安的史学家克服极端艰苦的工作条件,他们依托学校和研究机构,潜心钻研、互助协作,营造出乐观进取、宽松融洽的氛围。1937 年 3 月,张闻天组织了“中国革命史研究会”,成员有张爱萍、刘亚楼、莫文骅等,主要任务是编写中国革命史讲义,开展历史文化知识培训。为加强历史研究和教育,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历史研究室,直属马恩列斯著作翻译部,由

陈伯达兼任主任,成员有尹达、佟冬、杨绍萱等。1940 年初,范文澜接任历史研究室主任,随着叶蠖生、谢华、金灿然和唐国庆的陆续加入<sup>[9]</sup>,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成为当时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阵地。

1941 年,延安马列学院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其后,研究任务改由中国历史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共同承担。为了便于开展研究工作,中国历史研究室被分为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从 1942 年初拟定的三年研究计划来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转向国际比较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sup>[10]282</sup>。1943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被改组为中央党校三部,范文澜、叶蠖生等调往中宣部历史组。从形式上看,延安史学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各项工作未曾中断<sup>[11]</sup>。在北方大学工作期间,范文澜领导并参与该校历史小组,还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刘大年为副主任,成员有荣孟源、尚钺、王南、赵俪生、叶丁易、王冶秋,主要任务是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

此外,延安马列学院翻译部还组织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史学方面主要有柯柏年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政变记》,吴黎平、刘云合译《法兰西内战》。其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堪称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1938 年,杨松、吴黎平分别摘译了俄文版的第七章和结束语,刊于《解放》第 56、58 期<sup>[12]</sup>,1939 年,以延安解放社为代表的四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该书作为延安整风教材和“干部必读”书目,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意义。但是,随着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等被概念化、模式化,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消极影响。

## 三、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致力于方法的中国化、史的整理以至反投降理论的斗争及各种宣传活动<sup>[13]</sup>,出版了多本“应用或试图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成的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初期封建社会史,近世史、尤其是革命史著作等”<sup>[14]</sup>,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体系,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是开创了以社会形态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

通史体例。1941年,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巨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正式出版,该书开辟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通史体例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正趋向成熟<sup>[15]</sup>。《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被认为是党在延安完成的一件大事,至此,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sup>[9]84</sup>。

《中国通史简编》是以范文澜为首的延安史学家运用新历史观研究历史的典范之作。原计划由范文澜拟写提纲,历史研究室分工完成,主旨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但因初稿详略失当,不甚合用,于是范文澜便“从头写起”<sup>[16]17</sup>,1940年8月至次年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1941年完成下册(宋—清中叶)。结稿后,针对书稿的“四条缺点”和吴玉章等人的意见,编者又作了修订。该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为主线,注重从历史上生产关系的演进来说明阶级变化,突出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既完整勾画出中国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又分析了各个阶段的特点,驳斥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较好地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和一般性统一起来<sup>[2]1162</sup>。该书意识形态色彩鲜明,它建构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深入开展中国古史分期的论争。延安古史分期的论争是社会史论战关于中国历史分期讨论的延续。1940年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指出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五种形态的更替,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奴隶制度和封建社会特征的界定,参照古代典籍资料的记载,“在生产关系方面找出实际证明”<sup>[17]86-87</sup>,对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提出质疑。

对此,尹达持不同看法。他在《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独辟蹊径地运用考古学材料和传说中的史料等,重点考察了生产工具的演变及作用,指出殷代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其纽带之氏族社会的组织”<sup>[18]</sup>,从生产力方面论证殷代处于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其后,谢华、叶蠖生分别撰文批驳尹达的观点<sup>[19]</sup>。谢华从“最可靠的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中找出“殷代是奴隶国家”的三个论据;叶

蠖生则依据殷墟发掘的考古资料,推定殷代属于青铜器时代,“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奴隶占有制”。1941年1月,尹达又作《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指出考古学上关于殷商社会的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sup>[20]</sup>。

透过这场论争可以看到,延安史学家在研究路向和方法上的重大转变,逐步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转为重点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从偏重研究方法到开始重视史料,将“正确的史料”和“正确地分析史料”结合,求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用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他们已程度不同的摆脱以往对马列著作的注经式研究,逐步开始进行创造性地探索<sup>[21]</sup>。

三是构建以革命史叙事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1937年,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是共产党人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全书分为七讲,将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置于革命叙事框架之中,通过多维比较分析,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和承继关系。大致先从经济、政治状况入手分析社会变革的背景与起因,再以大量史实为根据展现革命运动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这种以“历史言说现实”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史”体系,启发了范文澜编写《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上册)》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又一力作,它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史的研究体系<sup>[2]1169</sup>。全书由八章和一个附录组成,上起鸦片战争,下至义和团运动,该书以革命史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分析革命路线、反动路线和改良路线的斗争及其演化,指出中国人民抛弃旧式的农民起义,转向自觉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展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两个过程”的论断。《中国近代史》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议政,借古喻今,渗透着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

另外,叶蠖生在广泛搜集中央文件、领导人谈话及口述历史资料等的基础上,写成《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他将1927—1937年的苏维埃运动划分为兴起与发展、巩固与扩大等五个阶段,首次全面展现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历程,该书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农村根据地创建史等很有价值。

四是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通俗史学建设。为了普及历史知识,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延安史学家编写了一批集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史学通俗读物,如边区政府教育厅组织编著的“文化教育丛书”,主要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以及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和《中国近代史常识》。这些通俗史学著作主旨鲜明,形式多样,语言通俗,特别是传统表现形式的融入更增加了作品的亲和力和可读性。

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史学的代表作。该书沿袭了《中国通史简编》的体例,在内容和文字上尽量通俗化和趣味化,真正做到用群众的语言写史。全书将从远古到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分为三编,每编有若干小节构成,每节又独立成篇,体例编排很有逻辑性,大致先是说这一阶段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其次则及于意识形态、文学及其他<sup>[22]</sup>。《中国史话》将唯物史观的新方法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旧形式结合,“使广大的劳苦群众,容易了解,能发动其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精神,实为抗战中可宝贵的历史读物”<sup>[23]</sup>。

#### 四、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期间,延安史学家坚持“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的研究方向,“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sup>[24]</sup>,注重发挥史学宣传革命、唤醒爱国心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中凸显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受此影响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研究重点由论证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逐步转向考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主旨是驳斥各种“外来说”,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有其自别于其他社会的个别特点”,但“它依然是遵循着一般的规律向前推移,向前发展”<sup>[25]173-174</sup>。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基于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和前途,提出“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

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sup>[26]</sup>就是说,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更应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

其次,秉持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sup>[17]809</sup>史学承载着文化传承、经验鉴戒和教化育人的重要功能,它超越“亭子间”“书斋里”的个别旨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意义,已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一种形式、一个部分、一条战线<sup>[27]</sup>,成为文化战线斗争的武器。正如叶蠖生所言,“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sup>[14]</sup>许立群编写《中国史话》旨在帮助广大群众学习历史知识,“加强我们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sup>[28]</sup>。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最鲜明的特征是立足民族抗战的伟大实践,致力于从历史资源中汲取经验,“把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应用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上”<sup>[29]</sup>。

再次,兼顾史料与方法,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甲骨文、铭文石刻、经传诸子、史书地志、诗文小说、歌谣戏曲中广泛搜集史料,融合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传统手法,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现积极向上的革命题旨,引起读者的思想共鸣,造成极好的宣传效果。延安史学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除了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范文澜的《古今中外法浅释》全面阐发“古今中外法”,进一步充实了“四面受敌法”。尹达坚持“从考古到史学”的研究路向,探索从考古发现、古代传说中钩稽史料<sup>[25]184</sup>,充分发掘史料的社会学价值。何干之倡导从经济的视角分析历史问题,透过经济形态的特征及其变动,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

当然,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一些缺陷。罗梅君通过对延安和重庆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比较,指出“延安历史学家被更牢固地统一到党的生活之中”,他们“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断”<sup>[8]158</sup>。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强调史学的阶级性及其功利性取向,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内容上,突出政治史、文化史,对经济史、社会史,乃至世界史关注较少,大量篇幅记述重大政治事件,缺少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内容,还有若干史实错误<sup>[10]3</sup>。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还存在“非历史主义”倾向<sup>[16]20</sup>,这些缺憾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2-533.
- [2] 吴汉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下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 [4]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7.
- [7] 张希贤.延安文化探考[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46.
- [8] [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M].孙立新,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 [9] 佟冬.我的历史[C]//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10] 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1] 林国华,陈峰.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J].山东大学学报,2006(3):77-85.
- [12] 吴黎平.苏联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经验与教训:论联共党史的结论[N].解放,1938-12-12(58).
- [13]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N].中国文化,1941-08(3-2,3).
- [14]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1979:140.
- [15]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燕京社会科学,1949(2):1-35.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17] 吴玉章.吴玉章文集: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18] 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N].中国文化,1940(2-1).
- [19] 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J].中国文化,1941(2-6).
- [20] 尹达.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N].中国文化,1941(3-1).
- [21] 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2.
- [22] 许立群.《中国史话》编者说明[M].沈阳: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1.
- [23] 吴玉章.《中国史话》序言[M].沈阳: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3.
- [24]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N].解放日报,1941-11-05.
- [25]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尹达史学论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M].重庆:新知书店,1947:1.
- [27]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6.
- [28]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N].解放,1938-09-11(52).
- [29] 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M].重庆:新知书店,1946.

## A Study o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Yan'a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JIANG Mingmin, SUN Jianhua

(Research Base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China)

**Abstract:**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Yan'an Perio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y the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rxist historians such as Fan Wenlan held the banner of patriotism highly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They interpreted history through a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summarized the law of Chines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systematically. They insisted on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ed and held the patriotic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set the direction for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Yan'an Period; patriotic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李 军)